

# 罗西-兰迪的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理论

苏珊·佩特里利著

王永祥译

## 一、与语言和非语言生产相关的人化过程

下面一段摘录除了揭示罗西-兰迪理论的总趋向以外，还为我们提供了批评性阅读本节关键问题的钥匙。这段话介绍了罗西-兰迪有关社会再生产符号过程的一般研究的基本概念，其中包括“人化”、“语言与非语言生产过程”、“社会规划”和“意识形态”：

随着资本有机结构朝着有利于其永恒方面的逐步改变，工人的价值已经下降；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变革都变得更为昂贵。这已逐渐证实了非人事物的结构，它仅仅是提及20世纪科技巨大发展的一种方式。但从资本的永恒这一面来看，人本身被压倒了：在生产中人被完全榨干。有必要从人归属的超人的结构去审视人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或许会认为，在新资本主义被宣布生效之前不太可能研究支持非言语行为的无意识程序……人显然是根据所有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程序而行动，而不仅仅是在新资本主义环境里行动。如果资本有机结构的新资本主义变化使得证实这种程序成为可能，或者支持它，那么相关的意识能有助于制定新的和更人性化的程序设计。但是，如果规划这些程序的用途就是要具有自由的特征而不是更加精制的压迫，那我们显然必须诉诸于更为普遍性的人与社会的理论；如果要完成规划，就必须诉诸于革命实践。一切的基础都是政治性的。（1994 [1972]：201）

罗西-兰迪关于符号过程、社会再生产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两极，表现于他关于人类化和非人类化过程的研究之中——即一方面是成为人的过程，“人化”过程，这涉及人类逐渐出现于历史舞台时生物材料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另一方面是“异化”过程，这首先是从语言-意识形态异化（因而是主体异化）视角考察的（参见Rossi-Landi, 1970; Ponzio, 1992b）。就前一情况而言，对人类的描述是：他们在具有历史和社会特征的符号材料中得以形成；就后一情况而言，对异化的危险的描述是：人类被他们自己生产的符号所压倒，这些符号是他们在这一特别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在市场逻辑和“技术革命”的语境中所生产的。

人化的最早期符号出现于某些高级灵长类动物开始劳动和生产物品之时。劳动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具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类型：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在人类世界里，若没有语言劳动，非语言劳动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亦然——语言劳动除非与非语言劳动联系在一起，否则也无法产生。罗西-兰迪在其早期作品（1998 [1961]）中就发现了非语言物质生产和语言物质生产之间的一种同源关系；这样，他为他理论化的同源法奠定了基础（Rossi-Landi, 1998 [1961], 1992b [1968], 1994 [1972], 1985a）。

劳动总是与符号系统相联系，这些符号系统依据某一社会规划而运行。劳动具有目的，并导致产品；同时，产品预设着劳动。活动是没有产品的输出；因此，它留下的仅仅是痕迹。劳动决定了预设着意向性、社会规划和意愿的变革，这种意愿调整着劳动的供应，尽管劳动者本人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即使劳动者没有意识到他生产产品的目的，但他的生

产能力——往往是通过无意识学习过程获得的——却未必受到影响。有意识的生命和无意识的生命都是通过符号阐释工作而形成——即，通过人化过程中的劳动而形成。弗洛伊德曾提到过“梦幻的劳动”。但意识的程度是次要的，因为所有社会行为都是根据某一社会规划而进行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学习活动的结果。

人类、社会现实和劳动（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劳动）同时出现，互相交织。我们必须以劳动开始：罗西-兰迪认为，正是劳动从一开始创造了社会维度，劳动立刻成为劳动与产品的混合物，劳动立刻以各种交换形式而出现。随着生产网络的扩展，劳动分工和交换——罗西-兰迪赋予其人类起源价值——变得更为复杂和清晰。一旦有了制定的各种预设着劳动规范的交换秩序，人类便开始出现了。人们已经识别出三种交换秩序：信息的交换、商品与劳务的交换、女人的交换，后两种也涉及信息的交换。罗西-兰迪说，人类个体就是这样通过劳动规范，通过渐趋机构化的交换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通过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的结合，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言语和非言语阐释性工作，人类获得了社会和历史的规定。

## 二、符号学视域下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异化批判

罗西-兰迪关于符号过程、社会再生产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另一极，关系到异化问题，因而关涉由资本现实和身份逻辑统治的世界里的非人化问题。劳动者也是语言劳动者，“完全沉浸于一个自然世界，过量生产的产品已经将这个世界转化为市场；在这里，操控大量的符号系统已经将他们从人类转变为消费者”（Rossi-Landi, 1982 [1978], 英译本：238）。人类原本是积极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生产的主体，却转变为被自己生产的产品压垮和榨干的消费者。人类劳动忘却了自己的作品，忘却了劳动本身的意义。这便导致意识与实践的分离；其结果是社会和语言异化的情形，这涉及到“他性的牺牲”，这是资本和市场逻辑的核心特征（参见Ponzio and Petrilli, 1999: 35-52）。

关于这些过程，罗西-兰迪提出了主体性批判，建议恢复人类劳动与其产品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方法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发展批判性哲学的建议，这种批判性哲学基于包含他性的人文主义中的马克思思想。他在阐释资本和市场逻辑的努力中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使意识“去异化”，恢复主体作为真正的人类主体的特征（参见1992b [1968], 英译本：83-106）。这涉及到恢复某些真正具有人性的价值，例如批判性意识、责任、创造性、自由——用巴赫金的术语，可以描述为“对话性应答”的条件，可以描述为“绝对他性”的主要条件（见第三章有关巴赫金的内容）。

在有关主体建构的研究中，尤其有趣的是罗西-兰迪的“一位作家的意识形态研究标准”（以意大利语写于1976年，现收录于Rossi-Landi, 1985：第八章）。在这里，如同之前的巴赫金一样，他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视其为真正人的价值形成的最可能的场所。他阐述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是从强调作者/主体着手，在最初形成作者/主体的语境中恢复他；这有助于克服对作者/主体的盲目崇拜（参见同上：187）；相反，第二个方法强调作者/主体的历史-社会语境及其摆脱即时语境的能力。罗西-兰迪对影响主体/作者的因素与主体/作者获取超额的能力作了区分。超额存在于主体/作者为了建构一个不同于自己但好自己的社会而产生的新价值；这些新价值传递给了读者。我们对主体/作者及其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评判可以通过重构主体、社会语境和超额之间的关系而进行，此时要记住一点：在使用“超额”这一概念时，罗西-兰迪——非常像巴赫金，但独立于巴赫金——是在研究外位的概念（巴赫金的局外人）。用罗西-兰迪的话来说：

文本可以看作发生在舞台上的活动，因而指向布景。所有的文本都包含或暗含

舞台与布景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重构这种辩证关系。假如作者在他自己的社会再生产方面有一些超额,那就好比舞台灯光朝着舞台背景延伸了一些;如果他将自己局限于重复获取的价值,那就好比舞台布景往前进了一些,从而把布景本身与舞台混在了一起。(Rossi-Landi, 1985a: 191)

罗西-兰迪指出了他的研究中两个主要参考领域:一方面是普通语言学、分析哲学和美国符号学,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外加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方面的读物(与恩佐·高利诺的会谈,1969,现收录于Rossi-Landi, 1994 [1972]: 210-94)。罗西-兰迪从这些领域借用了一些概念工具,构想了一个人类“全球科学”的项目。这种研究并未宣称无所不知;它只是确认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全球性”并将其理论化。此外,全球性要求,研究世界的科学都要具有全球性。罗西-兰迪以其同源法揭示了相互关联对于整个符号宇宙和对于特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性。他描述了如何识别下述同源关系:语言与劳动之间、语言劳动与非语言劳动之间、我们今天所谓的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语言学与经济学之间(1992b [1968], 1975a, 1985a, 1992a)。

罗西-兰迪以非语言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之间的同源关系为先决条件,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视角分析了社会再生产,商品被视为符号和信息,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脱离社会关系的商品。在这样的语境下,他引入了一系列新颖的概念(如今是非常相关的概念),例如“语言劳动”、“语言资本”、“语言货币”和“语言异化”。在努力恢复人类行为的普遍性、恢复意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时,他将商品解释为信息(受马克思《资本论》启发),将信息解释为商品:“人们从各个不同方面谈到信息转变为商品,”在一次会谈中他这样说着,并冲着本杰明·克劳斯、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戈德曼、列维-斯特劳斯、古尔维奇、列斐伏尔等等点头,因此“为什么不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为什么不将信息即商品的解释和商品即信息的解释置于同一层级?为什么不尝试一种统一的解释?”(参见1994 [1972]: 214-15)。

在意欲建构一种具有历史取向和唯物主义取向的普通符号学的项目中,罗西-兰迪提出了如下假设:生产系统、符号系统和意识形态相互关联,同步发展。根据他的描述,语言与意识形态依据某一特定的社会规划彼此之间具有辩证的联系,两者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一定涉及符号——事实上,意识形态唯有通过符号而产生——但并非所有符号(信号甚至更少)都具意识形态。此外,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这种固有的相互联系恰是他阐述符号和意识形态、将主体从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的项目的先决条件。他的一个可行的假说内容如下:

恰是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或者以更为一般的术语来表述,是符号系统和异化之间)密切的相互联系蕴含了引入语言学上(符号学上)去异化(去意识形态化、去神秘化)的程序的可能,最终目的是将语言劳动者(即作为语言说话者的人类)从主导性的共识网络中解放出来,促成新的共识,实现建立新型社会的计划。(Rossi-Landi, 1982 [1978]: 197)

符号不仅传递而且生成意识形态。这样,语言、意识形态和相关的主体概念唯有通过符号批判方可去神秘化,这种符号批判可以分析某一特定社会语境(即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某一流程)中的符号生产、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罗西-兰迪意欲建立“新型的、更为人性化的程序”,作为他的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发展一种新型的、更有意识的人文主义,它强调人类的符号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符号过程的人类维度。他要将符号学发展为解释性的、批判性的科学,对此作出了贡献;这样的科学就规范符号行为的社会规划随时采取自己的立场。这必然涉及到放弃被错误地等同于科学性的新实证主义的中立立场。根据去整体

化的世界观来看，根据这样一种认识：人类行为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程序化——因此这种程序化具有历史和社会规定性，具有政治取向——符号学的位置就是批判文化符码，并制定替代性程序。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符号学、语言哲学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突显人类的社会关系，在人类那里，以前仅仅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符号之间物化的关系。这一联系也指向意识形态与符号之间在理论层面上的互相蕴含关系。言语符号不仅是传递意识形态的手段与工具，而且是生成意识形态的场所，是创造意识形态的材料。意识形态现实是符号现实：哪里有人类的社会符号，哪里就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反之亦然：凡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都被赋予了符号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以隐喻的方式描述了意识的符号意识形态性，把意识描述为由社会符号材料构成的、连续不断的对话链。

这根意识形态的链条在单个意识之间伸展着，并将它们联系起来。毕竟，符号只产生于众多单个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单个意识本身就充满着符号。只有当意识充满意识形态的（符号的）内容，因而只有在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意识才能成其为意识（Voloshinov, 1929, 英译本：11）。

非常类似于“无限符号过程”（皮尔斯）的概念，非常类似于依据他性逻辑、在解释项符号与被解释项符号的对话互动中形成的“解释路径”理论（参见Ponzio, 1990a: 15–74; 1993a: 177–220），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将符号的意义置于它与解释它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之中加以识别。无限延长的符号链永远不会被打断，形成了客观的和社会性的意识与意识形态材料。这些并非脱离于外部公众世界的内部心理过程的结果；因此，意识与意识形态材料绝不是个人的、绝不是主观的东西。与以单线因果关系机械地解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相反，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连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都告诉我们：个人的意识是社会意识；还有，普遍的社会现实——从社会性的生产关系层面到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生产层面——就是符号现实。的确，知识和语言的获得只有在某一特定的符号意识形态语境（即：构成社会交际并成为社会交际特征的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以符号为中介的、对话性的、辩证的关系）中才有可能。

### 三、社会规划与多媒体传播

在本章开头引用于《符号学与意识形态》（Rossi-Landi, 1994 [1972]）的一段文字里，罗西-兰迪清楚地告诫我们，要谨防如下危险，即无意识地屈从于社会程序，屈从于看不见的“精制压迫”的形式，这种“精制压迫”形式带有神秘面罩，并被反常地误以为是解放实践。如今，大众传播工具的广泛影响，以及构成多媒体传播网络基础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广泛影响，代表了这种危险。

由于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这种多媒体传播网络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这已经催生了一种社会文化现实，这是通过充斥于网络的信息构建的现实——这些信息从数量、即时性、速度和流通等方面来说都是史无前例。例如，电视正在提供无数的频道和服务。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频道和节目之间遥控切换，并创造我们自己的互文本；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和传播自己的节目。

先进的科技（尤其是在过去30年左右时间里）已经在电子信息领域带来真正的“革命”，这不仅在专业领域，而且在日常生活（包括休闲时间）中，都产生了影响。由于大众媒体和电信的无所不在，由于电脑和其它高科技产品的广泛使用，通讯网络变得越来越强大，通过

一种似乎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过程达到了庞大的比例。由于各种服务和链接——调制解调器、便携式传真机、移动和卫星电话、电子邮件、因特网（我们通过这些可以查阅卷宗、预订旅馆房间、甚至开办公司——“虚拟公司”现在已成为现实）——每个人获取通讯网络都不再有时空障碍。

由于科技的进步促进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的发展，人类的符号达到了越来越高的表意（表示复杂性和社会符号物质性）水平。表意过程中的符号活动越复杂，符号程度越高，那么，在人类符号过程中促进人化过程的社会要素和生物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反馈机制的效果就越强。不妨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或许不久就有可能将人体与人造器官融为一体；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那半机械人将成为事实，而不是科幻。再考虑一下诸如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事故，或是获得授权的、对不知名的人进行放射性影响测试的实验，所带来的广泛而又破坏性的影响。绝不可以让技术革命蒙蔽我们的眼睛，从而看不见负责任行为的必要；健康的符号过程，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符号过程，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未来，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负责任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不可忘记，承担责任的能力是我们作为人类、作为“符号动物”（即：被赋予了叫做“语言”的独特的第一模拟装置的动物）的生物构成的一部分（见12.1.2）。

在大众传播和电信层面上，先进技术和符号信息量的增多带来的一个直接的负面影响便是信息超负荷和信息消费主义的产生。我们还得评估一下社会异化的危险程度，以及将市场上的产品（无论语言还是非语言产品）神秘化和物化的倾向。随着生产的信息冗余部分越来越多，作为主体的个人尽管积极参与了生产过程，却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因为参与未必是有意识和有目的性的。人们以为语言劳动者会免于技术革命的负面影响；就连他们也以各种方式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符号市场的蔓延，在这个市场中，意识与实践在一个生产周期里变得越来越分离，生产目的是生产本身，它基于实施市场价值却损害人的价值的理念。

至于作为使用者-消费者的主体的地位，很明显，传播网络不受控制的发展无法保证更高层次的批判思维、创新、负责任的参与和自由。相反，主体有屈从于看不见的、对应于资本和市场逻辑发展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危险，因而有屈从于压迫和剥削形式的危险，这些压迫和剥削形式因为在整个全球性的社会再生产系统中“无形的”传播而未被人们意识到。这样一种状态要求我们反思这样的问题：获取自由流动的信息能否让我们控制思想和符号市场？电子设备与使用者-消费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主体究竟是自己创建自己的文本，还是作为体制中的、作为从特殊阶层利益考虑的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作为某一社会规划和意识形态中的没有自己思想的仆人，屈从于符号市场的产品？现在的情况是有利于批判意识的发展，抑或是滋生新形式的社会异化？是谁在控制调节信息的生产、交换和流通的传播渠道？其目的是什么？那种控制实际上捍卫了什么价值？

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求我们考虑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划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希望其答案具有科学和伦理上的有效性，我们就必须超越符号市场的副现象层面去考察符号生产过程以及为其定位的社会规划。罗西-兰迪将统治阶级定义为“对某一社团的言语与非言语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实施控制的阶级”，他的这一定义得到了今天的社会现实的支持；他关于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具有符号中介性质的理论也是如此。

统治阶级决定哪些程序和意识形态可以调节某一社会的整体行为。意识形态就是社会规划，而主导某一社会的社会规划是由当权的阶级制定的（参见Rossi-Landi, 1994 [1972]: 203-4）。我们可以效仿罗西-兰迪，将统治阶级看作控制传播渠道，并为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制定规则的阶级。这样，在西方的“民主”中，大众传媒是社会规划的主要场所。因此，大众传媒在全体大众毫无思想的支持下行使社会权力和控制。的确，大众传媒在构建共识的过程中已经显示其强权与无所不在的特征，在开始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新世界秩序中，大众传媒就成功地传播了战争之“正确与必要”的意识形态（参见Ponzio, 1995a; Ponzio and Petrilli, 2000a）。

#### 四、文化资本与社会异化

在当今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再生产中，文化体系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这有几个重要的影响。第一，很难将意识形态利益与资本发展中的客观的物质利益分离开来。意识形态融入到生产过程的整体之中，并促进利润的生产。第二，鉴于文化是由符号构成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符号而传播——事实上，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符号而产生——文化体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便涉及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生产——其作用在当今的社会再生产中越显重要。“文化资本”这一说法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是当今现实的反应。语言和非语言劳动生产并发展着文化资本；如同所有生产资本的过程一样，在一个生产周期中，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反过来又增加文化资本。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主体都不一定意识到劳动最终的成品；更为重要的是，主体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为可以归类为劳动。罗西-兰迪说：

人付出了劳力，却没有意识到他为了某种目的而付出了劳力，因而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劳动。其目的如果是由一个未被意识到的社会程序强加的，那它或许就是超个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有别于意识冷漠或无意识地执行计划的活动。(1967-72, 15/16/17 [1971]: 22)

如前所述，我们正在描述的这种状况直接的暗示就是：服务于资本发展的意识形态是看不见的，而且，在我们大多数行为中反应出来的剥削大多是难以觉察的。当今时代——即：全球化时代——是最难以批判意识形态的时代，因而也是最难以分析社会异化的时代。从这个视角看，跟大众传媒相关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与审查制度有关，微妙（不是非常微妙）的审查形式在无人注意和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渗透进入传播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审查制度促进了被异化主体形成的过程。全球性传播给我们呈现的往往是一个统一的、独白性的整体，它即使不会致使批判性思维完全不可能，也会使它非常困难。跟它形成对比的是一种基于他性逻辑，（因而）是非冷漠差异逻辑的多元对话性体系。

大众传媒技术的主体往往会屈从于符号市场的需求；这样，主体的他性，主体的独特性，服从于身份逻辑。获取传播网络给人以自由的假象，而此时主体实际上承受着充斥于市场的自由流动的符号和信息所带来的无形的剥削和压迫。多媒体资本的利益大幅度地调节文化现实。然而，当宣告意识形态“危机”抑或甚至于意识形态“末日”时，当“异化”、“阶级利益”、“社会剥削”等表述被宣布落伍时，这些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而不加追究。当今的文化体制实际上需要一种文化资本再生产循环的批判，这种批判应重点关注符号、意识形态和普通社会规划所发挥的作用（参见Rossi-Landi, 1992a）。

符号和意识形态正越来越多地涉入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结果，个体已经承担了一个必须重新审视的角色。主体会无意识地融入到该主体自己也不知道其目标的过程；“异化的主体”这一术语对此无法完全解释。“异化的主体”想当然地取了主体概念，而事实上，这个概念因其特别的意识形态特征需要受到质疑。就“有形的异化”而言，主体受到忽略、谴责、被社会宣称为反常、病态、“精神异化”，因而对整个体制毫无用处。“无形的异化”——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如今关注的不仅仅是工厂里的生命；它延及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社会生活空间。不同于“有形的异化”，无形的异化服务于整个体制。于是，就“言说”主体而言，我们至少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异化：一是心理病理异化，它对应于我们所说的有形的异化；

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这种异化将异化的言说者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劳动者置于同一层次。

## 五、符号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当罗西-兰迪正在发展其学术思想时，社会再生产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言语与非言语交际——即言语与非言语符号——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资本主义宣布自己生效之前，还不可能研究构成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之基础的社会规划。同样，在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从而削弱资本的有机部分（即：劳动者的价值）之前，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去神秘化，并进一步揭示生产过程中主体被剥削和压迫的状况。在本章开头引用的一段文字里，罗西-兰迪宣称（Rossi-Landi, 1994 [1972]: 201），“人显然是根据所有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程序而行动，而不仅仅是在新资本主义环境里行动。”新资本主义对资本有机结构的变革使得这种程序的面纱有可能得以揭开。

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再生产周期在技术上非常先进，以至于很难看到程序设计过程以及这些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宣告；对异化和剥削的批判已被斥为时代错误。社会再生产系统已经被神秘化，并装扮成人类历史的自然结果；这就给人造成这样一个总体印象：该系统是无法逃脱的；因此，批判或革命实践的项目被斥为不切合实际，被斥为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社会政治层面，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宣告。然而，事实上，这个时代已经随着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两者的影响而被深深地意识形态化了。但宣告意识形态的危机或终结就相当于根据虚假的意识、虚假的思想和虚假的实践（这些都具有“无形的异化”的特征）而采取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样的立场是很难去神秘化的，除非将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批判结合起来。拒绝意识形态的概念就意味着认同既定秩序；这样的态度服务于这个体制，但对批判，因而对替换性社会规划的发展、对解放实践都是致命的。

在维持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背景下，电信和大众媒介——这是表示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符号中介关系的绝好表述——的作用相当关键。被利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电子革命是一回事，意识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尽管这两者未必互相排斥。正如罗西-兰迪所说：

新的意识和新的心智的建构将会体现于所有的实践层次和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但若没有全新的社会实践制度，这样的建构也无法完成。它涉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构，包括将所有主要的符号系统替换为更适宜的符号系统，从而为创造可以生活于新社会关系之中的新人类奠定基础。在相当一段长时间内，这项任务必须优先于其它所有事情。这项任务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政治的首要地位。所有真正的革新家最深远永恒的职责就是慨然投身于这项任务，无论他们宣告自己为“革命者”与否（革命者这个角色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实践——理论——实践这样一个辩证的循环中的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的个人努力做出了贡献，他们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Rossi-Landi, 1982 [1978]，英译本：344）

在符号学的语言中，在解释项符号层次，当解释项符号与被解释项符号之间建立了对话性批评的关系时，革命就完成了。这个关系植根于他性逻辑和能指过度，而并非处于可产性的层面，或者为基于身份逻辑和一般差异的系统服务的层面。他性、对话性和创造性等价值构成了逃避生产逻辑的条件，因而也构成了批判主体性和社会、语言异化的条件。解释项之间基于他性、对话性和创造性的关系使得主体抵制消极融入一个原本自然的自我再生的系统。

假如人是符号，假如符号属于一个或多或少异化的环境——即罗西-兰迪（同上：242）

所说的“虚假意识和实践的环境，它也是在话语层次上表达自己，因而变得真正意识形态化了，或者说，从我们谈论它那一刻起，它就是这样了”——那么，我们要想克服社会和语言异化，摆脱非人化过程，就要建立一个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我们所提倡的方法是基于对话性、他性和应答性理解的逻辑，基于外位逻辑。这样，它也许有助于打断生产、交换和消费周期的狂热节奏——这个周期是服务于维持现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这样，我们也许就能够维持创造性、差异、自由、非异化的自我和真正的人性。

本文原为From Susan Petrilli 与Augusto Ponzio合著的《Semiotics Undounded》一书中的第六章第三节，原题为：“Communication, Mass Media and Critique of Ideology”。根据此书后记，选载于此的第六章，原为Susan Petrilli所作。